

大西洋联盟体系中的“土耳其问题”

——基于联盟管理的视角*

杜东辉

内容提要:大西洋联盟中的“土耳其问题”是指土耳其日益偏离北约战略轨道而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北约是安全组织,但土耳其加入该组织既是为了制衡威胁,也是为了实现成为“西方国家”的身份目标。因此,安全威胁—安全供应和身份认同—价值供应的匹配程度均会影响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联盟紧密性。需要指出的是,安全和身份在联盟管理中的作用并不相同,前者是决定性变量,后者是辅助性变量。基于对两者的动态结构分析,可以发现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联盟管理模式经历了五个阶段:捆绑、强制、追随、平衡和疏离。当前双方关系的大幅波动归因于联盟管理困境:土耳其因担心“被牵连”而拒绝与盟国保持一致,又因无法实现身份融入而日益脱离西方定位;西方盟友指责土耳其偏离联盟轨道和价值观基础,但又不愿为其提供安全庇护和身份承认。双方在联盟管理的意愿和能力上出现错配,安全困境和身份困境形成共振。联盟资格的工具化、联盟合作的议题化和联盟管理的身份政治化将成为“土耳其问题”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土耳其 北约 联盟困境 身份认同 联盟管理

一 问题的提出

作为“冷战”的产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在后冷战时代逆势扩张,展现出强大的整合能力和凝聚力。然而,如今的北约却日益被土耳其的特立独行所困扰,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所谓大西洋联盟中的“土耳其问题”是指土耳其日益偏离北约战略轨道而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联盟内部矛盾的公开化。例如,土耳其因其与希腊的矛盾而拒绝参加象征北约团结的“老虎会”空演。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土耳其推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的动因、影响和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22CGJ040)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其二,联盟内斗的内政化。例如,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多次借助对北约的强硬表态和话语建构进行政治动员,为选举积累筹码。^①其三,相互依赖的武器化。美国利用军事制裁压服土耳其,土耳其则利用难民问题、地缘位置和成员国资格等相对优势迫使盟友尊重其利益。

具体来看,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渐行渐远有多重表现。第一,在战略和安全层面,土耳其不满盟国对其安全利益的忽视,不断减少对西方的安全依附,战略自主倾向日益增强。在军备领域,土耳其追求武器装备的自主化和来源多元化,试图摆脱被西方“卡脖子”的窘境。2017年,土耳其与俄罗斯签署购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招致美欧的强烈反对。美国根据《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对土实施制裁,并将其踢出F-35合作项目。第二,在安全合作对象的选择上“跨界结盟”,与北约的战略对手俄罗斯保持“暧昧”关系。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建立“阿斯塔纳机制”,削弱美欧的影响。^②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土耳其亦未追随盟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而是试图以中间人自居,在俄乌、俄欧(北约)、俄美之间保持多重平衡。^③第三,在联盟规范层面,土耳其将其北约成员国身份视为外交博弈的工具,无视西方国家对其破坏联盟团结的指责。2022年,瑞典和芬兰递交加入北约的申请,土耳其利用其否决权,要求两国在库尔德工人党、“居伦运动”(Gülen Movement)、军事制裁等领域满足其要求。由于分歧巨大,土欧爆发多轮口水战。

土耳其的“离经叛道”不可避免地引起北约成员国对其盟友资质的质疑。在西方媒体及相关学术成果中,土耳其经常被贴上“北约病夫”“特洛伊木马”“俄罗斯的卧底”“难缠的盟友”“滑稽的盟友”“不同路的盟友”“坡脚的盟友”“麻烦制造者”“兼职成员”等极具负面色彩的标签。与之相对应,土耳其毫不相让,指责西方渲染“伊斯兰恐惧症”,称北约非但没有维护其安全利益,反而成为其威胁的直接来源。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土耳其斥责美国与库尔德人合作,置其安全利益于不顾。2018年,埃尔多安在《纽约时报》撰文,扬言寻找“新的伙伴和盟友”;^④2022年,埃尔多安表示加

^① Burak Bekdil, “Turkey and NATO: From Loveless to Hateful Marriage,”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18, <http://www.jstor.org/stable/resrep16960>.

^② 杜东辉:《叙利亚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议题联盟”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2年第5期,第47-71页。

^③ 杨晨:《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表现、动因及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77-94页。

^④ Recep Tayyip Erdogan, “Erdogan: How Turkey Sees the Crisis With the U.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0,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8/10/opinion/turkey-erdogan-trump-crisis-sanctions.html>.

入上海合作组织是土耳其的“目标”。^① 宣称加入该组织可能只是埃尔多安与西方博弈的筹码,但足以说明其对北约的不满。

俄乌冲突在西方世界产生强烈的“聚旗效应”,暂时弥合了美欧矛盾,并挽救了走向“脑死亡”的大西洋联盟。^② 随着俄乌冲突的长期化,权力政治、阵营对垒和地缘政治竞争重返欧洲国际关系的主流,北约北扩加速推进。然而,与北约新一轮扩张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作为首批扩容成员的土耳其背道而驰,致使其盟友资格遭受广泛的质疑。如何理解土耳其与西方盟友之间大幅波动的联盟关系?如何界定大西洋联盟中的“土耳其问题”?推动土耳其与西方相互疏离的动力是什么?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二 文献回顾和研究不足

从联盟主导者美国的角度来看,土耳其的行为明显对大西洋联盟的凝聚力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如何管理这个不安分的盟友是其主要关切。但是,从土耳其的视角来看,西方盟友对其战略界定(欧洲安全的屏障和缓冲区)与其自我界定(欧亚大陆的“中心国家”)发生了明显的冲突。因此,“土耳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一)有关“土耳其问题”的既有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土耳其一直是西方的战略盟友。但是,近年来随着“土耳其问题”的演进,土耳其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呈现“亦敌亦友”和“忽敌忽友”的“叠加态”(Superposition State),引起学者的反思。孙德刚认为,“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中东地区的联盟政治呈现任务导向性、动态性、敌我界限模糊性的新特点,因此,传统的联盟类型分类已经不再适用。在其新的联盟谱系中,美土联盟被定义为“正式弱联盟”下的“功能性联盟”。^③ 对此,寿慧生提出不同的看法,他将美土关系界定为“模糊盟友”:脆弱多变、充满矛盾、似乎随时崩裂而又难以割舍,其特点是“盟

^① “Turkey’s Erdogan Targets Joining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Media Reports Say,” Reuters, September 17,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turkeys-erdogan-targets-joining-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sation-media-2022-09-17/>.

^② 胡伟星:《俄乌冲突、大国竞争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以地缘政治学为研究视角》,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4期,第20页。

^③ 孙德刚、张帅:《功能性联盟:“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地区联盟政治新范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9年第2期,第1-20页。

而不友”。^①就后果而言,许海云认为,“土耳其问题”不仅冲击了北约体制,还对土美关系、土俄关系、中东地区局势等产生影响,该问题的持续演进将导致北约走向扁平化与板块化。^②

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疏离的原因是学者重点关注的议题,主要观点可分为四类。第一,“联盟困境”论。塞尔哈特·古文奇(Serhat Güvenç)和索里·厄泽尔(Soli Özel)认为,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关系深受“联盟困境”的影响;西方盟友担心被土耳其“牵连”,土耳其担心被西方盟友“抛弃”。基于这一理论,两位学者认为,随着“阿拉伯民主化”的推进,土耳其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将得到缓解,土耳其对战略自主的追求也将告一段落。^③然而,现实发展与学者的判断正好相反。对此,塔里克·敖武兹鲁(Tarik Oğuzlu)指出,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关系已经出现了反转,土耳其考虑更多的是避免被北约“牵连”,而非被其“抛弃”,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北约自身的制度危机、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政府对国家身份和安全政策的理解共同塑造了土耳其新的联盟政治。^④

第二,“土耳其—欧盟—北约”三角关系论。自1999年欧洲安全与防务建设启动以来,北约与欧盟在安全领域是“相互补充”还是“相互替代”,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⑤土耳其学者普遍认为,欧盟安全战略不能忽视土耳其因素。^⑥慕尼韦尔·切贝奇(Münevver Cebeci)指出,只要欧盟继续在土耳其入盟问题上采取否定态度,并质疑其欧洲身份,土耳其就不会支持欧盟框架下的防务合作。在此背景下,“土耳其—欧盟—北约”实际上形成了陷入僵局的三角关系:欧盟拒绝土耳其,土耳其反对欧盟获得北约的军事能力。^⑦奥内尔·阿古(Öner Akgül)也指出,在北约与欧盟的竞合关系中,土耳其将是关键变量,欧盟安全倡议对北约军事能力的依赖为土耳其提供了施压

① 寿慧生、王倩楠:《模糊盟友:联盟体系视角下的美国与土耳其关系》,载《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2期,第132-156页。

② 许海云、田甜:《北约联盟体制中的“土耳其问题”》,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2期,第18-25页。

③ Serhat Güvenç and Soli Özel, “NATO and Turke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Between Abandonment and Entrapment,”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Vol.12, No.4, 2012, pp.533-553.

④ Tank Oğuzlu, “Turkey and NATO / Türkiye ve NATO,” *Adam Academ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3, No.1, 2013, pp.1-10.

⑤ 相关研究参见郑春荣、倪晓姗:《历史演进视角下的欧盟与北约关系走向——兼析拜登当选的影响》,载《国际展望》,2021年第2期,第45-64页;王瑞平、徐瑞珂:《欧盟防务一体化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2期,第26-33页;田德文:《解析欧盟“战略自主”困局》,载《欧洲研究》,2021年第5期,第36-52页。

⑥ Hakkı Büyükbaş, “Avrupa Güvenlik Strateji Belgesi ve Türkiye,” *Ankara Üniversitesi SBF Dergisi*, Vol.61, No.1, 2006, pp.37-66.

⑦ Münevver Cebeci, “NATO, AB ve Türkiye: OGSP Açmazı,” *Marmara Avrupa Araştırmaları Dergisi*, Cilt 20, Sayı 2, 2015, pp.95-120.

工具。^①

第三,非对称威胁论。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周边相继爆发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纳卡战争和俄乌冲突。非对称威胁论认为,由于地缘政治上的脆弱性,土耳其与西方盟友之间的威胁感知出现明显的错位,甚至是对立。这是自2016年以来,双方在“居伦运动”、库尔德武装、S-400防空导弹系统等问题上持续角力的主要原因。^② 塞津·伊巴·古尔索伊(Sezin İBA GÜRSOY)指出,威胁的分化为土耳其加入“非西方”或“反西方”联盟或阵线创造了基础。^③ 郭长刚认为,土耳其与北约的矛盾具有结构性,其根本原因是北约的“集体威慑”不能满足土耳其的安全需要,两者的利益出现了错位。^④

第四,国际权力转移论。美国作为北约的主导国,自然会根据其战略需求塑造联盟的战略方向。西纳·于根(Sinan Ülgen)指出,转向大国战略竞争的美国必然从对新战略实际或潜在贡献的角度来看待盟友。^⑤ 遵循该逻辑,冷战时代土耳其是北约的“前沿阵地”;在反恐时代,土耳其是西方的“安全门户”和“世俗榜样”;相比之下,自“阿拉伯之春”以来,西方对土耳其的角色定位就不再那么明确。战略重要性的下降促使土耳其强调战略自主:在多极环境中,土耳其将依靠多元的身份和战略资产提升其国际地位;在大国战略竞争之下,土耳其不应与北约保持一致,而是伺机而动,寻找“回旋余地”。^⑥

(二)既有研究的不足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经对土耳其疏离西方盟友涉及的各类要素进行了分析,如“联盟困境”、威胁感知、战略自主、国际权力转移等,并提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视角。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只是尝试对相关因素进行类型梳理,系统性的阐述并不多。

① Öner Akgül, “Soğuk Savaş Sonrası Dönemde NATO-AB İlişkilerinde Rekabet-İşbirliği Analizi ve Türkiye Faktörü,” *Güvenlik Stratejileri Dergisi*, Vol.4, No.7, 2008, pp.91-125.

② Alptekin Molla, “Soğuk Savaş Sonrası Körfez Krizleri ve Türkiye-ABD- NATO İlişkileri,”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Research*, Vol.7, No.11, 2009, pp.29-45; Mustafa Gün, “2003 Irak Krizi Sonrasında ABD-Türkiye İlişkileri,” *Bilge Strateji*, Vol.2, No.2, 2010, pp.137-168.

③ Sezin İba Gürsoy, “Turkey-US Relations (2016-2020): Transformation of the Asymmetrical Alliance,” *Ulusa: Uluslararası Çalışmalar Dergisi*, Vol.5, No.2, 2021, pp.133-144.

④ 郭长刚、梁莹莹:《土耳其与北约关系:战略自主还是联盟至上》,载《西亚非洲》,2023年第1期,第110-130页。

⑤ Sinan Ülgen, “Redefining the U.S.-Turkey Relationship,”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6 July, 2021, <https://carnegieeurope.eu/2021/07/26/redefining-u.s.-turkey-relationship-pub-85016>.

⑥ İlker İpekçi et al., “NATO'nun 2030 Vizyonu,” *İstanbul Esenyurt Üniversitesi İşletme ve Yönetim Bilimleri Fakültesi Sosyal Bilimler Araştırmaları Dergisi*, Vol.1, No.2, 2021, pp.19-39.

例如,国际权力转移论只勾勒了土耳其联盟政治变动的外在条件,对其内部因素关注较少。其他研究视角也存在以下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第一,“被抛弃—被牵连”的“联盟困境”理论有助于解释两极格局下联盟凝聚力的变化。但在多极时代,威胁的分化和流散导致“谁是威胁”是一个因时、因地和因事而异的问题,主导国担心“被牵连”和追随国担心“被抛弃”的旧式对应关系已经不再适用。例如,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弱勢的土耳其反而担心“被牵连”,担心伊拉克的崩溃刺激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倾向;而在叙利亚战争期间,土耳其则同时存在“被抛弃”(反恐问题)与“被牵连”(难民问题)的两方面担忧。因此,“联盟困境”作为一组结构性的变量还需要被置于过程和议题中进行分析。

第二,土耳其—欧盟—北约三角关系的研究路径表明,土耳其与北约的关系明显受土欧关系(入盟进程)的影响。但现有研究似乎只是从欧盟防务计划的阻碍因素理解土耳其的角色,没有意识到土欧关系的核心是土耳其欧洲国家身份的承认难题。土耳其与北约框架的关系的确受土欧关系的重要影响,因为在土耳其看来,加入北约和欧盟是其融入西方的既定步骤,是其实现成为“西方国家”及其内核“欧洲国家”这一身份目标的外在表现。从身份政治的视角看,北约向土耳其提供的不仅是安全庇护,而且是“西方俱乐部”的入场券。

第三,非对称威胁论赞同“威胁平衡论”的一般性假设,即苏联解体之后北约成员国面临的共同威胁消失,由此,土耳其在后冷战时代与盟友在威胁暴露(客观因素)和威胁认知(主观因素)上出现严重的分歧,进而导致联盟凝聚力被削弱。然而,苏联威胁的消失对北约成员国基本上是等效的,该视角不能说明为何是土耳其而非其他国家与北约盟国频频爆发矛盾。此外,威胁平衡理论也无法解释在共同威胁缺失的情况下,为何东欧国家想要以及能够加入北约。

从逻辑上讲,北约逆势扩张的动力或许正是土耳其与西方盟友关系中不具备的要素。因此,学界对北约扩张的解释似乎可以为“土耳其问题”提供反向思路。目前,解释北约“生命力”的观点主要包括三类:制度合作论强调北约高度的组织化水平和完善的管理架构所具有的制度功能;^①民主合作论赞同“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更容易克服内部分歧,使联盟得以维系;^②霸权合作论认为美国霸权护持的需要是北约

^① Robert B. McCalla, “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0, No.3, 1996, pp.445-475; Celeste A. Wallander, “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 NATO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4, 2000, pp.705-735.

^② Helene Sjursen, “On the Identity of NA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0, No.4, 2004, pp.687-703.

扩张的持续动力。^①

制度、权力(霸权)和文化(民主价值观)是否为北约的逆势扩张提供了动力并非本文讨论的主题,但它们显然都无法解释土耳其为何会疏离北约,也不能识别土耳其与西方盟友关系的特殊性。首先,北约的组织化水平对其成员都是有效的,土耳其也不例外;其次,土耳其虽然实现了议会制向总统制的过渡,但是其民主制度的基础和框架依然有效,行政权力的集中并没有动摇土耳其民主制度的基础,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并不能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再次,土耳其并不试图挑战美国的全球和地区霸权,反而是美国的霸权损害了土耳其的利益。因此,理解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关系还需要引入新的变量。

(三)既有研究解释力不足的原因

笔者认为,既有研究解释力的不足是由联盟研究的三重“对立”造成的。第一,国际关系研究(理论研究)与对外政策研究(战略研究)的二元对立。联盟是一种普遍的国际关系现象,联盟理论致力于揭示其产生、运行和瓦解的一般性规律,形成简洁的理论成果。在联盟理论的一般假设中,除了共同防御和集体威慑之外,联盟成员似乎不应奢望通过联盟关系实现其他目标。^②这种“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决定了联盟理论更多时候强调的是客观环境对行为体的影响,而非行为体的个性需求。然而,从对外政策的角度来看,联盟战略的实践虽然受国际体系的制约,但终究也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不可避免地受意识形态和领导人决策的影响。^③因此,联盟成员与联盟结构的关系既要考虑联盟理论的一般性假设,也要考虑行为体的特殊需求和偏好,实现理论研究与战略研究、体系与单元之间的融合。

第二,结构性分析与历时性分析的二元对立。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作为结构中的单元并无功能上的差异。在这一假设的影响下,联盟研究大多遵从静态结构分析的范式,强调联盟成员之间的权力分配对联盟成员政策偏好的影响,忽视历时性因素和过程分析的价值。事实上,结构寓于过程之中,过程有助于揭示结构的呈现方式。在联盟研究领域,由对“被抛弃—被牵连”的恐惧而形成的“联盟困境”是一组关键的结构变量。但是,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恐惧对象和恐惧程度都是不同的,联盟管理的策略自然也不尽相同。因此,将过程(纵向分析)与结构(横向分析)进行融合的动

^① Christopher Layne, "US Hegemony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NATO,"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23, No. 3, 2000, pp.59-91.

^② Celeste A. Wallander, "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 NATO After the Cold War," p.705.

^③ 宋伟:《联盟的起源:理性主义研究新进展》,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6期,第5页。

态结构分析更能揭示联盟关系的演化。

第三,理性政治与身份政治之间的二元对立。北约既是安全共同体,也是价值观共同体。北约接纳土耳其是为了更有效地制衡苏联的威胁,但从土耳其的视角来看,土耳其加入北约还有另一层含义:实现成为“西方国家”和加入“现代文明”的身份目标。安全威胁是土耳其加入北约的外部压力,身份认同则是其内部驱动力:前者是工具理性的范畴,后者则是价值理性的反映。可以说,土耳其与北约的关系同时受理性政治和身份政治的双重影响:前者衡量的是安全供需关系,后者导向的是价值供需关系。因此,对于大西洋联盟体系中的“土耳其问题”:一方面要考虑“安全威胁—安全供应”的匹配程度;另一方面还要审视“身份认同—价值供应”的匹配程度。

本文试图基于安全和身份构成的双变量,融合理性政治与身份政治、结构性分析与历时性分析,从联盟管理的视角重新梳理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关系。就正式的军事联盟而言,由于安全承诺和盟约的存在,盟友之间的互动本质上是一种相互制约和讨价还价的关系。联盟在形成之后即面临联盟管理的任务,而“土耳其问题”则是大西洋联盟管理不善的表现。所谓联盟管理,指的是联盟成员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维持联盟关系的实践,涉及成本与收益的评估、权利与义务的协调等;它是双向的,即联盟的主导国和追随国都可以充当联盟管理的施动者。^① 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所有的联盟成员都拥有利益最大化的本能诉求,因此,在联盟维持的过程中,主导国与追随国之间既存在共同利益,也可能面临多重矛盾。

三 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

就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关系而言,需要考虑双重特殊性。其一,土耳其既是中东地区的欧洲国家,也是欧洲地区的中东国家。在很长时间里,它还是北约中唯一的伊斯兰国家。^② 其二,遏制苏联是北约成立的重要前提,但其军事功能是在捍卫“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目标之下实施的,北约不仅仅是军事联盟,也是一个巩固特定意识形态的工具。这种双重特殊性的存在使得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互动同时具有理性政治和身份政治的色彩。

^① 凌胜利:《冷战后美日联盟为何不断强化?——基于联盟管理的视角》,载《当代亚太》,2018年第6期,第53页;凌胜利:《联盟管理:概念、机制与议题——兼论美国亚太联盟管理与中国的应对》,载《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第17页。

^② 2009年阿尔巴尼亚加入北约,约60%的阿尔巴尼亚人信仰伊斯兰教。

(一) 北约

与传统的军事联盟相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具有多重属性,其成员不仅联合防御,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开展广泛的合作。自诞生之日起,北约便是一个由安全(制衡共产主义威胁)、利益(恢复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和价值观(自由民主)构成的复合共同体。

其一,北约是安全共同体。集体防御是北约的基础属性,军事互助是其能够维持至今的核心要素。冷战结束后,北约向“军事、政治、安全”组织转变,但其军事功能并未被削弱。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北约的集体安全属性再次得到强化。2022年,北约马德里峰会批准的《北约2022战略概念》重申:确保集体防御和盟国安全是北约的核心使命,威慑与防御、危机预防与管理、合作安全是北约的三项核心任务。^①新版“战略概念”更加强调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负面影响,突出大国竞争带来的安全挑战。此外,该文件还把俄罗斯描述为“直接威胁”,并认为中国构成“系统性挑战”。新版“战略概念”表明,军事冲突和阵营对抗仍然主导着北约的地缘战略思维。^②

其二,北约是价值观共同体。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共享价值观是北约凝聚力的主要来源,而北约成员对自由、民主、法治等创始价值观的维护是北约维持至今的基础。^③《北大西洋公约》的前言提到:“(成员国)决心捍卫其人民的自由、共同遗产和文明,这些原则是建立在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的基础之上。”^④与威胁、权力和利益相比,价值观具有稳定性,这也是学者将其视为北约“长寿秘诀”的重要原因。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显示,在过去5个世纪里,有63个主要的军事联盟,其中寿命超过40年的只有10个,防御联盟的平均寿命为15年。^⑤价值观不仅深刻塑造了北约干预境外事务的行为逻辑,而且成为改造“伙伴”和“入盟者”的手段。

强调北约的价值观基础,对于理解土耳其与北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曾长期占据土耳其政治主流的世俗派精英认为,加入北约既是土耳其西化改革的自然结果,也

^① NATO,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June 29, 2022, <https://www.nato.int/strategic-concept/>.

^② 有关近年北约战略转型的研究,参见徐若杰:《北约战略转型:动力、趋势及政策影响》,载《欧洲研究》,2022年第5期,第59-82页。

^③ Nathalie Durhin, “NATO and Its Founding Values: Renewal of Vows or ‘Conscious Uncoupling’?” in Stephen J. Mariano, ed., *NATO’s Strategic Foundations: Values, Deterrence, and Arms Control*, NATO Defense College, 2020, p.5.

^④ NATO,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Washington D.C., April 4, 1949,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7120.htm.

^⑤ Daniel Franklin, “How NATO Is Shaping up at 70,” *The Economist*, March 14, 2019, <https://www.economist.com/special-report/2019/03/14/how-nato-is-shaping-up-at-70>.

是对其西方国家身份的确认。1951年10月,土耳其外长穆罕默德·福阿德·科普鲁鲁(Mehmet Fuat Köprülü)在庆祝土耳其获准加入北约时表示:“大西洋公约不仅是一个军事和政治共同体,而且是一个文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民主国家共同体。”^①这种将北约成员与“西方国家”“文明国家”和“民主国家”身份挂钩的话语在后来不断被重复。^②1999年,土耳其总统苏雷曼·德米雷尔(Süleyman Demirel)重申:土耳其加入北约不仅是为了缓解安全焦虑,而且是因为土耳其对北约的“共同价值观”怀有坚定的信念。^③

然而,从成员国的文化属性来看,北约又是异质性的价值观共同体。早在土耳其加入北约之前,西方决策者内部就存在质疑之声。1951年,美国驻北约代表查尔斯·斯波福德(Charles M. Spofford)指出,跨大西洋联盟的基础是共同的文化传统、民主体制和宗教认同,这些因素使其有别于纯粹的军事联盟,而土耳其的加入则会使“大西洋联盟”的概念失效。^④不难看出,在斯波福德眼中,西方文明的基础是基督教传统,土耳其因其宗教和文化上的差异不能算作大西洋联盟的一员。然而,在阵营对抗和冷战思维盛行的大环境下,土耳其的战略价值掩盖了它在文化属性上的异质性。但在后冷战时代,那些被遮蔽的身份差异则有可能暴露出来,成为联盟管理的阻碍因素。

综上所述,北约的第一属性是非对称性的安全共同体,第二属性是异质性的价值观共同体。土耳其加入北约的目标具有双重性:制衡苏联的威胁和成为“西方国家”。这种双重性决定了联盟管理的双重内涵:其一是实现“安全威胁—安全供应”的匹配(显性逻辑);其二是实现“身份认同—价值供应”的匹配(隐性逻辑)。对于这两组关系,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侧重存在明显的差异。西方盟友需要土耳其在遏制苏联、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上提供协助,因而看重其安全价值;土耳其则需要盟友的安全保障和身份承认,因而既重视联盟的安全供给,也在意北约成员的身份内涵。

^① Reem Abou-el-fadl, *Foreign Policy as Nation Making: Turkey and Egypt in the Cold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37.

^② 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希望归属的“西方”主要指的是欧洲而非美国,因此,成为“西方国家”还意味着土耳其要成为欧共体或欧盟成员国,参见 David Kushner, “Westernism in Contemporary Turkey,” in Jacob M. Landau, ed., *Ataturk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 Westview Press, 1984, p.236.

^③ Süleyman Demirel, “Turkey and NATO at The Threshold of a New Century,” *PERCEP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 No.1, 1999, <http://sam.gov.tr/pdf/perceptions/Volume-IV/march-may-1999/Suleyman-Demirel.pdf>.

^④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Certain Diplomatic Offices, Washington, March 31, 1951,” *FRUS*, Vol.III, Part 1, 1951, pp.505-506.

(二)“联盟困境”与联盟管理

联盟管理主要应对的是盟友在安全合作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威胁的存在是联盟建立的必要前提,而联盟分歧很大程度上来自联盟成员对“威胁”的不同定义。具体而言,威胁具有如下属性:第一,客观性。行为体造成威胁的可能性及其实际效果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例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认为,在“威胁”概念的构成要素中,综合实力、进攻实力、地缘邻近性都是可测量的。第二,主观性。对威胁的界定通常是一个认知和心理过程,受宗教、文化、历史和民族心理的影响。在非对称联盟关系中,联盟主导者对假想敌的界定通常比较直接,但联盟追随者更关注自身弱点所产生的安全问题。^①因而“威胁感知”的差异势必影响联盟的紧密性。第三,非对称性。威胁对联盟成员造成的伤害不是等效的,这种差异可以通过盟友对联盟发起的军事行动的不同态度来判断。在阵营对抗或两极格局中,威胁的非对称性较小,联盟成员对主要威胁有较程度的共识;但是在多极时代,威胁趋于分散,联盟成员容易在威胁的界定上出现偏差。威胁的非对称性受威胁来源的距离远近、联盟成员的易受攻击程度不同等因素的影响。

缓解“联盟困境”是联盟管理的重要目标。概而言之,“联盟困境”与联盟成员对“成本—收益”的权衡密切相关,主要包括“被抛弃”和“被牵连”两个维度。^②一般而言,当联盟成本上升、收益降低时,联盟成员维持联盟关系的动力下降,此时“联盟困境”更多表现为担心“被牵连”;当联盟成本下降、收益上升时,联盟成员维持联盟关系的动力增强,此时的“联盟困境”更多表现为担心“被抛弃”。^③在非对称的联盟内部,实力较弱的成员国“被牵连”的可能性越小,则“被抛弃”的可能性越大;“被抛弃”的可能性越小,则“被牵连”的可能性越大。^④可见,主导国担心“被牵连”与追随国担心“被抛弃”虽然是“联盟困境”的常态,但联盟主导国和追随国实际上都面临“被抛弃”或“被牵连”的困境,并导向不同的联盟管理类型(见表1)。

^① Hui Ying Lee, “Insecurities of the Unimportant: Singapore’s Threat Perception Against the Rising China,”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Vol.48, No.3-4, 2021, p.177.

^②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36, No.4, 1984, pp.461-495.

^③ 凌胜利:《双重困境、特朗普冲击与文在寅政府两强外交的逻辑》,载《韩国研究论丛》,2018年第2辑,第20页。

^④ 许善品、张涛:《联盟困境、理性选择与澳美同盟的有限升级》,载《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第120页。

表 1 “联盟困境”与非对称联盟的联盟管理类型

	主导国	追随国
惧怕“被抛弃”	类型 I :拉拢 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	类型 II :追随 自我改变以获得主导国的安全承诺
惧怕“被牵连”	类型 III :强制 迫使盟友做出改变以适应联盟的安全需求	类型 IV :疏离 无力促使盟友尊重其安全利益,采取不合作态度

注:表由作者自制。

类型 I :主导国担心“被抛弃”。此时联盟管理的施动者为主导国,其策略取向为“拉拢”,即通过向追随国提供更加坚定的安全保障和经济支持以获得追随者的“忠心”。由于实力差距,主导国担心被抛弃的案例通常比较少见,主要集中于追随者获得比较优势的几种特殊情况。例如,在两极格局和阵营对抗的情势中,一些处于关键位置的国家由于同时被敌对双方拉拢,因而,其能够在结盟问题上获得较多的议价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向名义上是英国的盟友,但实际上奉行中立的土耳其提供租借援助;^①在冷战期间,苏美先后在“不结盟”的埃及进行大规模的投入。^②在这两个案例中,主导国都担心失去占据关键地位的追随国,害怕它们倒向敌对势力而改变权力平衡。此外,在进攻性强国与防御性弱国组成的联盟关系中,也会出现主导国更担心“被抛弃”的情况。^③

类型 II :追随国担心“被抛弃”。此时联盟管理的施动者为追随国,其策略取向为“追随”,即通过自我改变增强联盟承诺的可靠性。在联盟关系中,追随国由于对联盟的依赖程度大,“被抛弃”的代价也就更大。因此,在这种“联盟困境”中,追随国倾向于做出让步以换取盟友更为坚定的承诺,如军事援助、政治声援和心理支持等。例如,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在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中,皆出现过因担心被美国“抛弃”而做出让步的情况,包括接受美国驻军、分摊美军费用、承认美军的治外法权等。事实上,联盟的制度化水平与联盟成员的自主化程度二者不可兼得,非对称联盟中的追随国为了获得安全保障的制度化,就不得不出让一部分防务自主权。

^① 1939年10月19日,英、法与土耳其在安卡拉签署互助条约,正式缔结联盟关系。

^② 对于埃及与苏美先后结盟的原因,参见李典典、孙德刚:《埃及“隐性联盟”战略转型及其动因》,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3期,第110-130页。

^③ 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22页。

类型Ⅲ:主导国担心“被牵连”。此时联盟管理的施动者为主导国,其策略取向为“强制”,即迫使盟友做出改变以适应其战略规划。主导国的安全利益相对广泛,并且不愿被盟友“拉下水”,卷入与自己利益无关的冲突之中,因此,对主导国来说“被抛弃”远没有“被牵连”可怕。为了避免被盟友拖入危险境地,主导国通常会对联盟义务附加更多的条件,或者在“被牵连”的危险出现时迫使盟友做出改变,甚至是采取惩罚措施(如削减经济援助、暂停军事合作、搁置高层对话等)强迫盟友服从自己的要求。不过,联盟主导者一般不使用武力改变盟友的政策。^①由于实力分布的差异,联盟主导者拥有更多避免“被牵连”的资源,这也是为何主导国“被牵连”的情况极少出现的原因。^②

类型Ⅳ:追随国担心“被牵连”。此时追随国无力迫使盟友尊重其安全利益,而主导国又不愿改变联盟的整体战略取向,联盟管理困境由此产生。作为普遍的联盟管理范式,“拉拢”“追随”和“强制”的共同特点是都有明确的施动者,这些联盟管理手段能够奏效的前提是双方对威胁的判断存在一致性,并存在讨价还价的空间。但在追随国担心“被牵连”的“联盟困境”中,追随国本身并没有能力改变主导国的决策,而主导国则没有意愿改变战略部署以满足追随国的诉求。在此情势下,联盟关系会出现大幅波动,联盟内斗的烈度上升,追随国倾向于拒绝参与联盟主导国发起的军事行动,甚至与联盟的战略对手和假想敌开展安全合作,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处理自身安全事务。

综上,“联盟困境”是联盟管理的核心内容,其性质塑造了联盟管理的类型。这一点也可以从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关系史中得到佐证。除了20世纪50年代的“蜜月期”之外,“联盟困境”一直贯穿于土耳其与盟友的关系中,先后表现为主导国担心“被牵连”(塞浦路斯危机、古巴导弹危机)、追随国担心“被抛弃”(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追随国担心“被牵连”(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俄乌冲突)。从上文的推理可知,追随国担心“被牵连”的“联盟困境”容易导致联盟管理困境。但实际上,土耳其与盟友(主要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和俄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对这种差异的理解,需要引入“身份认同—价值供应”的视角来理解。

(三) 身份认同与联盟管理

“身份”这一术语来源于社会心理学,指行为体在与重要“他者”的互动过程中投

^① 参见刘丰:《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6期,第97-98页。

^② Tongfi Kim, “Why Alliances Entangle But Seldom Entrap States,” *Security Studies*, Vol.20, No.3, 2011, pp. 350-377.

射的独特性。^① 需要指出的是,英文中的“Identity”具有双重含义:一是行为体确立社会地位的依据,即“身份”;二是行为体追寻和确证自己身份的过程,即“认同”。^② 而所谓国家身份,即国家基于对自身特质的理解,与他者相互建构、不断变化的一种意象。^③ 国家身份可分为两类:一是基于宗教、族裔和历史传承等因素形成的内生性国家身份;二是基于权力关系、等级结构、地理位置、对现行秩序的满意程度而形成的外源性国家身份。两者的区别在于,内源性国家身份具有较强的动员能力,容易触发身份政治行为。就土耳其而言,其内源性国家身份包括突厥语国家、伊斯兰国家等;外源性国家身份包括中东国家、高加索国家、巴尔干国家等。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身份通过确定国家利益、塑造国家角色和培育集体认同对一国的安全观和联盟战略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国家的安全感或不安全感并非绝对的“现实”,而是涉及国家对外部环境和外国意图的主观评估。因此,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建构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实践过程。^④ 身份具有关系性、互动性和主体间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每个国家都以某种身份与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进行互动;反过来,其他国家对其自我身份的反馈又会影响一国对自我身份的调适。认同与承认的匹配是国家间良性身份互动的前提。如果一国的身份定位得不到相应的认可,便会导致“承认难题”,形成“身份困境”。

历史经验表明,在共同威胁存在的前提下,国家的身份认同对于联盟形成和联盟维持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在结盟阶段,即使是敌对的国家也能摒弃意识形态差异和身份对立。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同盟,用丘吉尔的话说:“如果纳粹进攻地狱,我起码也会替魔鬼说两句好话”。^⑤ 就联盟维持而言,如果存在强大的共同威胁,身份冲突通常会被掩盖。例如,尽管民主普遍被认为是北约成员国的身份标签,但是在冷战时代,成员国的非民主行为并没有对联盟合作造成负面影响。北约成立时葡萄牙还处于独裁时期,土耳其也数次出现军队接管政权的情况,但均未招致大量批评。为了保障安全功能的有效执行,此时联盟成员在价值观问题上通常采取灵活立场。然而,共同威胁消失后,维系联盟凝聚力的直接因素不复存在,联盟成员之间的身份差异便凸显出来,并对联盟维持产生重要影响。二战结束之后,英美与苏联的

^① Ronal L. Jepperson et al.,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9.

^② 王緬、范红:《国家身份建构:文化外交的基本理论命题》,载《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9期,第273页。

^③ 李慧明:《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身份》,载《学术论坛》,2017年第12期,第65页。

^④ 孙吉胜:《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263页。

^⑤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价值观冲突加剧,最终成为冷战爆发的重要诱因。冷战结束后,共同威胁的消失以及文明冲突论的甚嚣尘上导致宗教、文化和价值观差异日渐成为联盟管理的潜在议题。北约成员多次就人权、民主、难民问题指责土耳其;土耳其则抨击盟国蓄意制造“伊斯兰恐惧症”。2023年年初的焚烧《古兰经》事件,使得土耳其与瑞典、芬兰的纷争呈现出明显的身份政治色彩。^①

基于上述认知,联盟中异质性追随者的身份管理策略会对联盟凝聚力和联盟维持产生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需要结合具体安全环境来判断。大体而言,在共同威胁的有无与身份认同的强弱构成的框架中,大概有四类身份管理策略,它们对于联盟管理的影响不尽相同(见表2)。^②“身份融入”是通过自我身份改造而强化群内相似性的捆绑策略,它有助于产生有关联盟共享价值的集体知识,形成“安全—身份共同体”,如历史上的“神圣同盟”、土耳其与阿塞拜疆的“血盟”、英美在二战时期的“特殊关系”等复合联盟;“身份抑制”即压制内部对联盟质疑和反对声音的策略,目的是确保安全合作和联盟战略的稳定性、可持续性;“身份护持”是主动维护联盟成员身份和联盟共享价值观的策略,目的是提升自身对于联盟的重要性;“身份创造”是偏离联盟的价值观基础,建构符合自身位置的身份策略,新的国家身份很可能与联盟主流价值形成竞争或背离,导致联盟管理的难度上升。在上述分类中,只有第一类形成了比较明确的联盟管理策略,即“捆绑”。

表2 异质性追随国的身份管理策略对联盟管理的影响

	身份认同(强)	身份认同(弱)
共同威胁(有)	身份融入 形成“安全—身份共同体”和相互捆绑的联盟管理范式	身份抑制 身份冲突被遮蔽,联盟的战略方向并不受太大影响
共同威胁(无)	身份护持 适应联盟的价值观基础,强调其对于联盟的价值	身份创造 偏离联盟的价值观基础,重塑国家身份,身份政治兴起

注:表由作者自制。

^① Ebad Ahmed, “Does Denmark Have an Islamophobia Problem that It doesn’t Like to Admit?” Anadolu Ajansı, January 31, 2023, <https://www.aa.com.tr/en/europe/does-denmark-have-an-islamophobia-problem-that-it-doesnt-like-to-admit/2802633>.

^② 有关土耳其身份管理策略的详细研究,参见曾向红、张峻溯:《偏离“欧洲化”:身份管理策略视角下的土耳其外交转型》,载《欧洲研究》,2022年第1期,第136-162页。

在共同威胁消失(两极格局解体)的背景下,威胁趋于分散,主导国和追随国更容易在威胁的定义上出现偏差,此时威胁的非对称性成为联盟管理的核心内容。由于实力差距,追随国对威胁的非对称性通常更加敏感。因此,在共同威胁消失的背景下,还需将身份管理策略与威胁非对称性的大小进行结合分析(见表3)。对于追随国而言,如果威胁的非对称性较大:(a)在“身份护持”情势下,追随国不得不在强烈的身份认同与不利的安全局势之间做出取舍,因而倾向于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采取口头追随但实际有所保留的“平衡”策略;(b)在“身份创造”的情势下,追随国的身份政治勃兴,主体意识增强,倾向于采取“疏离”策略,即独立地解决自身的安全焦虑。如果威胁的非对称性较小:(c)在“身份护持”的情势下,追随国倾向于“追随”策略;(d)在“身份创造”的情势下,联盟关系的战略性将被削弱,此时的联盟合作将表现出明显的议题性,即追随国根据自身获益的可能性决定是否参与或支持盟友主导的军事行为。需要指出的是,如上文所示,追随国的“联盟困境”(担心“被抛弃”和“被牵连”)和身份管理策略(身份护持和身份创造)都可以导向“疏离”和“追随”。但前者更多是情势所迫,是追随国基于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后者则更具主动性和塑造性,更具身份政治的色彩。因此,两种“追随”的耦合将使得联盟管理更容易进行,而两种“疏离”的耦合将导致联盟内斗的烈度上升,联盟关系的波动性增大。

表3 威胁的非对称性与身份管理策略对联盟管理类型的影响

	身份护持	身份创造
威胁的非对称性(大)	(a)平衡	(b)疏离 (追随国担心“被牵连”)
威胁的非对称性(小)	(c)追随 (追随国担心“被抛弃”)	(d)议题合作

注:表由作者自制。

综上所述,就异质性的非对称联盟而言,与安全因素相比,身份认同对于联盟管理的作用是次要的、辅助性的和有条件的。在共同威胁消失的情况下,身份认同的作用才会凸显出来,但仍需结合威胁的非对称性程度来审视。身份认同对于联盟管理的作用机制在于:身份既可以使联盟成员产生亲近感和向心力,从而减轻联盟管理的难度;也可以放大联盟内斗的烈度,影响联盟管理策略。身份管理策略的引入识别出“捆

绑”和“平衡”两种联盟管理策略,并丰富了“追随”和“疏离”的内涵和解释力。

(四)分析框架

大西洋联盟中的“土耳其问题”超出了传统联盟研究提炼的威胁平衡、利益平衡、权力平衡等观点的解释范围,因为,这类理性主义的研究视角忽视了联盟的身份和价值功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些后发国家试图加入西方的安全和政治组织,从而实现“西方国家”身份的制度性承认,这时的联盟政治也就具有了身份政治的内涵。事实上,土耳其在加入欧洲委员会(1950年)、北约(195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1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1972年)的过程中,身份问题通常被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①反过来,如果不引入“身份”这一辅助性变量,就无法解释后冷战时代土耳其与北约关系的大幅波动,也无法解释正发党政府联盟战略的深刻变化。基于此,本文以共同威胁的有无、威胁非对称性的大小为主导性变量,以身份管理策略为辅助性变量,重新搭建理解土耳其与盟友关系的分析框架(见表4)。

表4 土耳其与西方盟友之间联盟管理策略的形成

	威胁		身份	联盟管理的施动者	联盟管理的核心问题	联盟管理策略
	非对称性	共同威胁	身份管理策略			
冷战初期 (1952-1962年)	小	有	身份融入	双方	安全供需与身份认同的耦合	捆绑
冷战中后期 (1963-1990年)	中	有	身份抑制	主导国	主导国担心“被牵连”与身份冲突的遮蔽	强制
后冷战十年 (1991-2001年)	小	无	身份护持	追随国	追随国担心“被抛弃”和追随国的身份护持	追随
正发党前期 (2002-2010年)	中	无	身份护持	追随国	追随国担心“被牵连”与追随国的身份护持	平衡
中东剧变以来 (2011-)	大	无	身份创造	双方	安全困境和身份冲突的共振	疏离

注:表由作者自制。

^① Yücel Bozdağlıoğ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 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Routledge, 2003, p.4.

为了确保概念的可操作性和论述的连贯性,需要做三点说明。第一,本文中的“共同威胁”特指两极格局条件下的体系性威胁。第二,威胁的“非对称性”指的是外部威胁对联盟成员造成伤害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可通过联盟成员对相关军事行动的态度和联盟内斗的烈度来判断。如果威胁的非对称性导致联盟成员不惜与联盟的战略对手开展“跨界合作”,此时威胁的非对称性大;如果联盟成员之间的分歧在联盟机制内部就可以得到解决,表明威胁的非对称性较小;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即联盟内斗公开化但尚不影响联盟的战略稳定性)则被视为威胁的非对称性中等。第三,本文虽然将北约定义为安全—价值共同体,但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土耳其在安全和身份上的关切呈现双轨制的特点:“安全威胁—安全供应”的匹配程度主要表现为土耳其与北约的关系;而“身份认同—价值供应”的匹配程度日益与土耳其的入盟进程挂钩。因此,在具体论述层面,本文重点关注土美联盟关系和土欧关系。

联盟管理是在联盟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的,本文并不讨论联盟解体的情况。需要指出的是,北约的价值观基础并不存在制度性的保障,因而,成员国的身份偏离并不会招致一致性的惩罚。其一,成员国对所谓的北约共有价值并不存在共识。西方学者虽然将“民主”作为联盟成员的身份标签,但北约既非在民主授权下成立,也非在民主决策结构中运行,其民主合法性只是一种“幻觉”,而鼓励民主可能只是后冷战时代美欧低成本的安全战略。^①其二,北约并不存在规范成员国身份创造和价值偏离的机制。近年来,由于民粹主义抬头,北约专家提出不少强化联盟价值观基础的建议,如落实“一体化建设项目”、监督成员国的民主和人权记录等,但这些建议并不具备实施的基础。^②

在制度设计上,北约也没有剥夺成员国资格的机制,这为成员国的战略漂移和身份创造提供了安全阀。共同威胁消失后,异质性追随国虽然无法影响联盟对主要敌人的界定,但它可以选择调试自我定位,选择是否继续追随联盟的价值叙事和战略取向。就土耳其而言,它如果放弃“西方国家”的定位而走上战略自主的道路,北约所内含的价值共识和行为规范也就不再对其构成内在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其偏离联盟轨道的行为虽有助于自身的战略信誉,但并不会招致实际的损失;相反,北约资格的工具化却可以大幅提升其议价地位。结果是土耳其利用其成员资格获得了不对称的影响,而盟国却无可奈何。

^① Helene Sjursen, “On the Identity of NATO,” pp.693–695.

^② Nathalie Durhin, “NATO and Its Founding Values: Renewal of Vows or ‘Conscious Uncoupling’?” pp.10–12.

四 联盟管理视角下土耳其与北约的关系演进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信奉“凯末尔主义”(Kemalism)的政治精英接受了一套最为激进的现代化方案。对他们来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唯一方案。^① 这种观念对土耳其的内外战略产生深远影响:对内,被认为是愚昧和落后的传统文化需要全盘革新;对外,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成为土耳其现代国家身份的证明。可以说,对融入西方的渴望构成土耳其加入北约的深层次动力。

(一) 捆绑:主导国与追随国安全和价值供需的耦合(1952—1962年)

历史上,南下获取温水港是俄罗斯帝国的重要战略诉求,为此,它与奥斯曼帝国产生了延宕数世纪的冲突,成为“东方问题”的重要发展脉络。“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放弃扩张主义和不平等条约,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苏土关系进入少有的“蜜月期”。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及之后,苏联诉诸实力外交,试图修改一战后形成的政治安排。具体而言,苏联向土耳其提出如下要求:修改苏土边界现状,对1921年《莫斯科条约》的“不公之处”做出调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苏联的军事基地;修改《蒙特勒公约》,拒绝西方国家的军舰进入黑海。^② 在土耳其看来,苏联的要求不啻将其作为战败国对待,严重威胁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此,土耳其积极向英美靠拢,争取两国的支持。“土耳其问题”由此成为美苏冷战兴起的重要环节。

为了支持土耳其,1947年,美国出台了“杜鲁门主义”,随后还将其纳入“马歇尔计划”。在土耳其看来,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虽然重要,但是缺乏制度保障。因此,在欧美防务合作的讨论阶段,土耳其就试图参与其中。^③ 美国决策者再三表示,在大西洋的安全实现之前不会考虑其他地区的安全架构。^④ 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土耳其提供了展示其战略价值的绝佳机会。战争爆发后,土耳其迅速做出反应,向朝鲜战场派遣一支五千人规模的作战部队。^⑤ 1951年9月20日,渥太华北大西洋理事会第

^① M. Şikri Hanioglu,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Kemalism,” in Ahmet T. Kuru and Alfred Stepan, eds., *Democracy, Islam, and Secularism in Turke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32-60.

^② “The Ambassador in Turkey (Wilson)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Ankara, June 18, 1945,” *FRU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The Potsdam Conference)*, Vol.I, 1945, pp.1020-1022.

^③ Şaban Haliş Çalış, *Turkey's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and Western Alignment in the Modern Republic*, I.B.Tauris, 2017, pp.87-88.

^④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February 17, 1949,” *FRUS*, Vol.IV, 1949, pp.117-120.

^⑤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Turkish Ambassador (Erkin), Washington, August 19, 1950,” *FRUS*, Vol.V, 1950, p.1296.

七届会议同意邀请希腊和土耳其入约。^① 北约接纳土耳其显然是出于战略安全层面的考虑:土耳其既是遏制苏联的前线阵地,也是阻止苏联向中东“渗透”的主要屏障;土耳其如果放弃亲美路线,将会对美国的近东利益和中东亲西方势力产生负面影响。

从土耳其的视角来看,加入北约是其成为“西方国家”的关键步骤。后来的修正主义冷战史学对根深蒂固的“冷战论调”提出挑战,认为苏联对土耳其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不应忽视土耳其利用美苏矛盾的意图。^② 其一,土耳其拒绝苏联联合布防海峡的建议,却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其二,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撤回要求,并主动改善双边关系,但土耳其不为所动。^③ 这两个事例都表明,苏联的威胁具有建构属性,而从结果上来看,“苏联威胁论”无疑为土耳其融入西方提供了便利的工具。土耳其的信念是明确的,即务求加入所有西方组织,以此证明其“现代的”“西方的”国家身份。得益于冷战环境,土耳其先后加入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欧洲委员会、北约、经合组织。1963年,土耳其与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签订《安卡拉协定》,获得联合国地位,为全面融入欧共体铺平了道路。^④ 土耳其领导人在国内外场合多次强调了这类条约的身份意义。^⑤

在土耳其与北约关系的蜜月期(1952—1962年),由于安全供需和价值供需的耦合,双方形成了“相互捆绑”的联盟管理策略:在安全层面,土耳其成为北约的重要资产,北约则为土耳其提供了制衡苏联的安全保障;在身份认同层面,美欧通过接纳土耳其,打造出一个符合其价值观的“忠实盟友”,而土耳其则通过制度化融入摆脱了“局外人”的身份窘境。北约成员资格深刻塑造了土耳其的内政和外交:在政治层面,土耳其推行民主化改革,改善在西方的形象;在对外关系层面,土耳其以“西方文明”的代言人自居,拒绝参与中东地区事务。对于苏联的缓和姿态,1962年1月,伊诺努(Mustafa İsmet İnönü)总理表示,土耳其不会与西方之外的国家建立联系。^⑥ 这一时期,土耳其不遗余力地献身于“皈依者的事业”,甚至表现得“比西方更西方主义”。^⑦

(二) 强制:主导国担心“被牵连”和身份冲突的遮蔽(1963—1990年)

^① “Editorial Note,” *FRUS*, Vol.III, Part 1, 1951, pp.574-575.

^② 参见 Melvyn P. Leffler, “Strategy, Diplomacy and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Turkey, and NATO, 1945-1952,”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71, No.4, 1985, pp.807-825.

^③ Şaban Haliş Çalış, *Turkey's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and Western Alignment in the Modern Republic*, pp.107-108.

^④ 根据条约,在经过17年的过渡期后,土耳其可以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正式成员。

^⑤ Şaban Haliş Çalış, *Turkey's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and Western Alignment in the Modern Republic*, p.131.

^⑥ Feroz Ahmad, *Turk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1975*, C. Hurst & Company, 1977, p.401.

^⑦ Kemal Karpat, ed., *Turkey's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1950-1974*, Brill, 1975, p.6.

加入北约的最初十年,土耳其对北约始终保持忠诚,并在国内和国际为其辩护。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与盟友的关系开始不睦,这主要表现为三个事件。第一,古巴导弹危机。1957年,北约巴黎峰会正式做出部署中程导弹的决议。土耳其对此态度积极,认为在其领土上部署拥有一定控制权的核武器将提升自己在北约中的地位,加强与美国的联盟关系。1961年10月,朱庇特导弹正式在土耳其投入使用。然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肯尼迪政府决定撤回土耳其的导弹,以换取苏联的让步。在整个过程中,土耳其并未受邀参与危机解决,而只是被当作“交易筹码”。美苏之间的“导弹交易”使土耳其意识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仅限于与其利益相一致的情况。^①

第二,约翰逊信笺事件。1964年,塞浦路斯三世大主教兼总统马卡里奥斯(Μακάριος Γ)准备修改塞浦路斯宪法,限制土耳其裔的自治权利。作为回应,土耳其伊诺努政府命令其空军在塞浦路斯上空示威,并以武力相威胁。土耳其的行动招致美国的反对。约翰逊总统去信伊诺努,向其传达如下观点:土耳其如果因擅自行动而招致苏联的卷入,北约将不会保护土耳其免受苏联的进攻;美国援助的战争物资不得用于任何形式的入侵。^② 这封信件被媒体披露和曝光之后,土耳其国内出现大规模的反西方和反美浪潮。许多土耳其人开始质疑与北约高度绑定的做法是否明智,主张把日益僵化的土美关系转化为“灵活联盟”。^③

第三,塞浦路斯危机。1974年,支持与希腊合并的塞浦路斯国民卫队策划了针对马卡里奥斯的政变。根据1960年土耳其、英国和希腊三方达成的保障塞浦路斯秩序的协议,土耳其政府要求两国介入,但遭到拒绝。1974年7月20日,土耳其军队在塞浦路斯北部登陆,控制了约40%的岛屿面积。^④ 对此,美国参众两院相继通过了对土武器禁售和停止军事贷款的议案,之后福特总统虽然行使否决权,但其否决决议又被众议院推翻。1975年2月5日,美国对土武器禁售正式实施。美国的制裁引起土耳其的反制,包括废除美土《联合防御合作协议》、关闭北约的军事基地等。^⑤ 作为北约成员和西方的坚定追随者,武器禁运触动了土耳其的“脆弱神经”,揭开了联盟关系中

① 吴林章:《美国撤离土耳其“朱庇特”导弹的决策、交涉及影响》,载《世界历史》,2018年第3期,第57-71页。

② Kemal Karpat, ed., *Turkey's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1950-1974*, p.18.

③ Ferenc A.Vali, *Bridge Across the Bosphorus*,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 p.158.

④ Erik J.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I.B.Tauris, 2017, p.279.

⑤ 1977年8月4日,美国解除对土耳其武器禁运。参见郭长刚、梁莹莹:《土耳其与北约关系:战略自主还是联盟至上》,第120页。

的“遮羞布”。^①

在身份管理方面,冷战中后期土耳其出现了反思西方身份定位的思潮。20世纪七八十年代崛起的新一代穆斯林知识分子对西方发起批判性反思。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是殖民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文明,而欧洲文明则是基督教传统和资本主义的混合,土耳其的突厥—伊斯兰传统无法与之兼容。^②不过这些反思因其激进立场并没有进入主流,世俗主义势力仍然牢固控制着国家政权。亲西方的军队通过三场军事政变(1960年、1971年和1980年)沉重打击了国内的左翼势力和伊斯兰势力,“西方身份”定位得以延续。1981年,希腊加入欧共体,土耳其的身份危机意识上升。有媒体人表示:“他们已经成为欧洲人,而我们仍然是亚洲人。我们离加入欧共体的日子越来越远了……西方正试图将我们与欧洲分离,把我们变成一个中东国家。”^③在此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加紧推行自由化改革,以满足欧共体的准入标准。

在冷战中后期(1963—1990年),美国惧怕的是“被牵连”,即担心苏联卷入土耳其事务而触发美国的互助义务。这一时期,美国拥有规范盟友行为的能力和意愿,因而,由压服、威胁和制裁等手段构成的“强制”成为联盟管理的主导范式。同时,土耳其对西方身份的反思虽然浮出水面,但遭到世俗派的压制,土耳其的身份叙事仍然锚定在西方和欧洲。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北约中的身份少数派,土耳其对平等问题异常敏感。土耳其人认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遭受西方的不公对待。因此,每当西方国家偏袒希腊之时,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关系便会趋于紧张。特别是在塞浦路斯这一事关土耳其民族情感的问题上,西方的偏袒做法导致土耳其民怨沸腾。^④

(三) 追随:追随国担心“被抛弃”和追随国的身份护持(1991—2001年)

冷战结束之后,北约开始走上转型道路。1991年,新版“战略概念”首次将危机管理和冲突预防列入北约的任务。^⑤1999年的“战略概念”进一步将宗教冲突、侵犯人权、领土争端等不稳定因素纳入危机管理的范畴。^⑥与此同时,基于民主、人权和法治

^① 李秉忠:《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两个结构性问题:库尔德问题和亲西方外交》,载《土耳其研究》,2018年第1期,第6页。

^② 杨晨:《土耳其的宗教、政党与政治——以伊斯兰政党的兴起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7年,第105页。

^③ David Kushner, “Westernism in Contemporary Turkey,” p.239.

^④ Şaban Haliş Çalış, *Turkey's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and Western Alignment in the Modern Republic*, p. 228.

^⑤ NATO, “The Alliance’s New Strategic Concept (1991),” November 7, 1991,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3847.htm.

^⑥ NATO, “The Alliance’s Strategic Concept (1999),” April 24, 1999,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7433.htm.

的“共同价值观”在所有版本的“战略概念”中都得到了强调。对土耳其而言,共同威胁的消失和冷战的终结削弱了它对于美欧的战略价值,并使其产生身份危机意识。事实上,正是通过在西方安全体系中发挥作用,土耳其的“西方身份”才获得有限承认。因此,当北约试图通过将自由、人权话语与干预行动相结合进而重塑其组织属性时,正在试图巩固其“欧洲身份”的土耳其抓住机会,积极支持北约发起的军事行动。^①

在北约盟国发起或主导的海湾战争(1991年)、干预波黑战争(1994—1995年)、轰炸南斯拉夫(1999年)、阿富汗战争(2001年)等军事行动中,土耳其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土耳其派遣特种部队参战,不仅允许美国使用其领空,还为其提供了后勤和情报支持。^②事实上,土耳其是唯一与上述被干预地区存在历史、宗教和文化联系的伊斯兰国家。许多观察家认为,这种联系是北约完成使命的重要资产。作为拥护世俗民主制度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的积极参与有助于北约在伊斯兰世界克服宗教和文化障碍。^③在后冷战时代,北约从集体防御转向集体安全,并日益重视价值观和多边主义规范。在此过程中,土耳其通过积极内化联盟的价值观和参与联盟主导的军事行动,维护其“西方国家”的身份定位。

然而,冷战的终结也放大了土耳其与欧洲在宗教、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欧洲在自我界定中越强调文化因素,土欧之间的裂痕就越大。在入盟问题上,欧盟委员会认为,土耳其应首先解决领海争端、塞浦路斯问题、库尔德问题等。由于希腊拥有正式成员国身份,土耳其入盟就不得不接受与其国家利益相悖的解决方案。在库尔德问题上,接受欧盟的自治方案也就意味着要在领土完整的概念解释上做出让步,此举必然遭受国内右翼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对。1997年12月,欧盟卢森堡峰会决定与10个东欧国家和塞浦路斯开展入盟谈判,土耳其被排除在外,这一决定引起土耳其的强烈不满。作为回应,土耳其则利用北约成员资格阻止欧盟组建快速反应部队。^④

在此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的土耳其虽仍以加入欧盟为目标,但其内部世俗主义力量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加剧,两派围绕国家身份展开激烈辩论,而外交战略自然沦为两派争夺的战场。在1995年大选后,亲

^① Müge Kinacıoğlu and Aylin G. Gürzel, “Turkey’s Contribution to NATO’s Role in Post-Cold War Security Governance: The Use of Force and Security Identity Formation,” *Global Governance*, Vol.19, No.4, 2013, p.597.

^② Ozlem Kayhan and Dan Lindley, “The Iraq War and the Troubled US-Turkish Alliance: Some Conclusions for Europe,” in Joseph S. Joseph, ed., *Turke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l Dynamics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218.

^③ Petros Vamvakas, “NATO and Turkey i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Possibilities and Blind Spots,” *Turkish Studies*, Vol.10, No.1, 2009, pp.57-74.

^④ Yücel Bozdağhoğ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 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p.82.

伊斯兰的繁荣党成为第一大党,并于次年成功组建联合政府,该党领袖内吉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出任总理。埃尔巴坎持激进的反西方立场,认为土耳其不应成为欧盟的“仆人”,而要承担起领导伊斯兰世界的角色。出任总理后,他先后出访伊朗、利比亚、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主张组建“穆斯林发展中国家八国集团”。^① 埃尔巴坎的泛伊斯兰主张及其对西方文明、西化政策和“凯末尔主义”的否定招致军方的不满,加之联合政府无力应对国内的复杂矛盾,致使其在1997年下台。

在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十年,土耳其担心“被抛弃”是其与西方盟友关系的主导因素,联盟管理的施动者是土耳其,其策略是“追随”。在安全层面,通过追随北约盟国发起的军事行动,维护其对于西方的战略价值;在身份认同层面,积极申请加入欧盟,试图通过民主化改革巩固“西方国家”的身份定位。不过,在后冷战时代,土耳其的政治光谱日趋复杂,伊斯兰政党首次登顶政治舞台,尽管昙花一现,但表现出强烈的反西方精神。作为世俗主义和“西方国家”定位的捍卫者,土耳其军方再次充当了“身份护持”的核心力量,政治伊斯兰势力对亲西方外交的挑战以失败告终。

(四) 平衡:追随国担心“被牵连”和追随国的身份护持(2002—2010年)

土美关系是土耳其与西方盟友关系的核心和基石。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土美关系虽然遭遇挫折,但大体保持稳定。1999年,克林顿总统访问土耳其,并将两国关系定性为“战略伙伴关系”,强调两国的战略合作具有全方位和多层面的特征,认为两国在欧洲、高加索、中亚和中东地区存在广泛的利益重叠。^② 然而,好景不长,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土耳其追随盟友的政策和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土耳其议会拒绝批准美国从土耳其开辟第二战线的计划,原因在于:其一,土耳其民众、领导人和军官普遍质疑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其二,土耳其担心伊拉克倒台后,其库尔德地区有可能成为独立的库尔德国家,进而与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分离势力形成共振,恶化土耳其的安全局势。

土耳其并非杞人忧天。伊拉克战争时,库尔德人成为美国的盟友和萨达姆政权的掘墓人;战后,库尔德自治区获得“准国家”地位。同时,伊拉克作为统一的民族国家被摧垮,而伊北部的动荡又为库尔德工人党的生存提供了地缘空间。伊拉克战争之后,土耳其不得不同时与破碎的伊拉克政府和独立意识日渐增强的库尔德自治区政府

^① 陈德成:《论土耳其埃尔巴坎政府的外交政策》,载《西亚非洲》,1997年第4期,第12-18页。

^② Ozlem Kayhan and Dan Lindley, “The Iraq War and the Troubled US-Turkish Alliance: Some Conclusions for Europe,” p.218.

打交道,并时刻做好应对局势之变的两手准备。有学者认为,美西方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的扶持是20世纪以来中东地缘政治最为重要的发酵因素。^①此后,库尔德因素成为土耳其安全观念和地区政策的重要考虑变量,库尔德问题成为土耳其与西方盟友关系中的焦点问题。

在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层面,21世纪的最初十年,土耳其和西方均出现深刻的变化。2001年“9·11”事件之后,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成为西方关注的焦点,文明冲突论和伊斯兰威胁论甚嚣尘上,欧洲社会的反穆斯林情绪急剧增加。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调查,超过50%的西欧人对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持怀疑态度。在荷兰和瑞典等国,这一比例高达70%。^②这种舆论环境对土耳其的入盟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土耳其的加入就意味着七千万穆斯林将能进入欧洲社会,这是欧洲国家所不能接受的。从土耳其的角度看,2002年,国内发生“选举地震”,伊斯兰色彩浓厚的正发党赢得选举,并获得议会的绝对多数,从而开启了该党及其领袖埃尔多安20余年的连续执政。

与外界的担忧相反,正发党政府坚持“西方身份”定位,并对入盟异常积极。这是因为正发党虽然掌控了政府和议会,但司法机构、警察部门和军队却不受其控制。因此,实现对军队和其他国家机器的政治控制,确立文官的统治地位,成为正发党的严峻考验。在这一过程中,欧盟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成为正发党的关键“盟友”。为了开启入盟进程,正发党政府采取多重举措:在话语层面,土耳其发起“文明联盟论倡议”,^③认为土耳其可以在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建立沟通桥梁;在地区安全层面,土耳其加入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强调恐怖主义与宗教没有必然联系;在国内政治层面,为了达到欧盟的标准,从2003年10月到2004年7月,土耳其议会通过了261项法律,涉及军队、司法和人权等广泛议题。^④这波改革浪潮使土耳其日益接近“欧洲国家”的准入标准,2005年入盟谈判正式开启。

在正发党执政前期(2002—2010年),土耳其面临“被牵连”的“联盟困境”,即担心伊拉克陷入混乱而危及自身边界安全、社会稳定和主权完整,但此时土耳其对西方规范的重视又使其没有偏离联盟轨道。这一时期联盟管理的施动者是土耳其,其策略

① 李秉忠:《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两个结构性问题:库尔德问题和亲西方外交》,第13页。

② Ozlem Kayhan and Dan Lindley, “The Iraq War and the Troubled US-Turkish Alliance: Some Conclusions for Europe,” p.221.

③ 详细主张和活动参见土耳其外交部网站, <https://www.mfa.gov.tr/the-alliance-of-civilizations-initiative.en.mfa>。

④ Erik J. Zürcher,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p.340.

是“平衡”,即在对自身不利的军事行动与身份护持之间寻求政策上的折中。与阿富汗不同,伊拉克是土耳其的邻国,土美两国对威胁的感知明显错位,而美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要以牺牲土耳其的利益为代价。但伊拉克问题并未彻底恶化土美关系,因为正发党政府的入盟目标需要美国的支持和配合。需要指出的是,在土耳其国内,同样是坚持“身份护持”策略,军方的目的是维护世俗主义原则,防止伊斯兰势力坐大;而正发党政府的目的是借助入盟改革打击军方势力,结束军队干政的历史。

(五) 疏离:主导国与追随国安全和身份冲突的共振(2011年至今)

2011年中东变局发生之后,土耳其与西方盟友在安全和认同问题上的矛盾集中爆发。在叙利亚问题上,最初土耳其与盟友试图联手推翻巴沙尔政权,借机推广“土耳其模式”。^①但“伊斯兰国”的崛起却将双方推向对立面:北约盟国转向打击恐怖主义,并选择与叙利亚库尔德民兵(在土耳其看来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分支)合作,并帮助其扩大势力范围;土耳其则转向打击库尔德人,避免叙利亚北部出现库尔德自治实体,从而与伊拉克北部连成一片。^②由于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持续演进,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渐行渐远,在中东诸多问题上的矛盾也日益显性化。^③土耳其转而与北约的战略对手俄罗斯、伊朗跨界合作,形成叙利亚问题三方“阿斯塔纳机制”。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土耳其同样拒绝追随北约。俄罗斯虽被视为北约的威胁,但却是土耳其重要的能源和经济合作伙伴。为了保持独立,土耳其在道义上反对俄罗斯,但在行动上保持超脱,执行“不亲美也不亲俄”政策。^④这种超脱政策进一步为其斡旋冲突提供了条件。

与此同时,土耳其与西方盟友在价值观上的冲突日趋激烈。西方国家指责土耳其民主倒退,包括打压政治对手、威胁记者、控制媒体、镇压库尔德人和宗教少数群体。有学者认为,北约的创始价值观在土耳其成为“稀缺商品”。^⑤根据2018年美国“自由之家”的报告,土耳其被列为“非自由国家”;根据同年的“世界司法报告”,土耳其的法治指数在113个国家中排名第101位。^⑥作为回应,埃尔多安以“卡舒吉事件”为靶

① 参见李秉忠:《“土耳其模式”刍议》,载《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第136-151页。

② 宫小飞、石斌:《叙利亚危机与美土关系的疏离》,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5期,第94-108页。

③ 李秉忠、吉喆:《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的国家治理及西方的误读》,载《欧洲研究》,2018年第2期,第135-152页。

④ 孙德刚、李典典:《俄乌冲突与中东安全伙伴的异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1期,第58页。

⑤ Peter S. Goodman, “The West Hoped for Democracy in Turkey. Erdogan Had Other Idea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8,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8/18/business/west-democracy-turkey-erdogan-financial-crisis.html>.

⑥ Burak Bekdil, “Turkey and NATO: From Loveless to Hateful Marriage,” p.3.

子,抨击美国民主和人权观的虚伪。面对土耳其高涨的反西方情绪,部分北约专家认为,土耳其已经成为联盟的“负担”。^① 2021年,拜登政府举行民主峰会,土耳其作为其盟友没有受邀参会,表明价值观分歧已经严重削弱了土美联盟的紧密性。近年来,土耳其与西方密集爆发的冲突(卡舒吉事件、驱逐大使事件、焚烧古兰经事件、亚美尼亚惨案的定性等)使双方日渐形成“他者化”的身份互动。

不仅如此,欧盟一直以“人权纪录”为由拖延土耳其的入盟谈判,而东地中海油气资源争端、土希领海争端、难民问题、塞浦路斯问题等地缘政治事件也成为土欧的“心头刺”。随着入盟谈判的搁置,深陷承认难题的土耳其日益偏离“欧洲化”的身份策略,转而以“原生”身份资源为基础,重构土耳其的身份叙事。^② 土耳其学者认为,土耳其可凭借“历史纵深”和“地理纵深”成为欧亚大陆的“核心国家”或“枢纽国家”,充当现代伊斯兰潮流的引领者、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的塑造者和中东发展模式的榜样。^③ 在政策层面,“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土耳其身份自觉意识提升,试图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和跨区域的合作伙伴关系,包括调整与西方不对称的联盟关系;高调介入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安全事务;与卡塔尔、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 Hamas等政治伊斯兰势力建立亲穆兄会阵营,塑造中东次体系。^④

自2010年年底的“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同时面临着“被牵连”的“联盟困境”和国家身份难以获得承认的身份困境。土耳其不愿被北约的战略规划捆绑,但没有能力改变盟友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和偏好;同时,土耳其对独立国家身份的追求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与盟友关系的震荡。在体系层面,转向大国竞争的美国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计划,并倾向于依据对新战略的贡献程度重新对盟友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土耳其战略地位的相对下降使美国没有动力管理大西洋联盟体系中的“土耳其问题”。在安全困境和身份困境的共同作用下,土耳其与西方盟友出现了联盟管理困境,并导致土耳其与其西方盟友关系的战略性和全局性下降,议题性和工具性增强。

五 结论

北约既是战略性的军事联盟,也是基于共享价值观的认知联盟。这两种属性相互

① Burak Bekdil, “Turkey: NATO’s Odd One Out,” *BESA Center Perspectives Paper*, No.491, 2017.

② 曾向红、张峻溯:《偏离“欧洲化”:身份管理策略视角下的土耳其外交转型》,第136-162页。

③ 刘欣:《试析战略纵深主义对土耳其外交的适用性——基于隔离行为体的视角》,载《国际观察》,2017年第4期,第87-101页。

④ 杜东辉:《从大西洋到大周边:土耳其复合联盟战略初探》,载《西亚非洲》,2022年第6期,第125-155页。

影响、互为表里。北约的安全属性为西方价值观的延续提供了硬基础,而成员国的身份认同则为联盟的寿命延续和规模扩张提供了软基础。然而,北约作为军事联盟是非对称性的,作为认知联盟是异质性的。土耳其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非对称性联盟中的追随国,也是认知联盟中的异质性国家。因此,土耳其与盟友的关系互动同时具有理性政治和身份政治的色彩。本研究表明,在异质性联盟内部,如果联盟成员之间安全需求和身份需求的匹配度和耦合性较高,可产生超越传统联盟的“安全—价值共同体”,形成“相互捆绑”的联盟管理模式;如果安全需求和身份需求的匹配程度较低,甚至出现双重背离,则容易形成“相互疏离”的联盟管理困境。

当前大西洋联盟体系中的“土耳其问题”即由安全困境与身份困境的共振所致。在安全层面,土耳其处于中东、巴尔干和高加索等动荡地带,地缘政治环境具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自冷战结束以来,土耳其周边地区战乱频发,导致威胁感知的异化。土耳其的合理关切无法得到盟友的照顾,安全需求与安全供给不匹配。在身份认同层面,土耳其只能融入西方的安全圈,难以被更具政治、文化和文明属性的欧盟接纳。土耳其的身份需求与盟友的价值供给同样是不匹配的。身份困境和安全困境的共振导致锚定双方关系的两根支柱出现动摇,联盟关系出现剧烈波动。

本文建立了一个融合身份政治与理性政治的分析框架,并据此识别出不同时期土耳其与盟友的联盟管理模式,为理解“土耳其问题”提供了一个综合视角。该框架也有助于解释以下困惑:双方在安全和身份上的冲突不断,但为何又要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本文认为,上述两根支柱虽出现动摇,但并没有倒塌。从土耳其来看,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是其在大国之间周旋的关系性权力来源;同时,至少在口头上,土耳其一直没有放弃加入欧盟的目标。从西方来看,土耳其既充当了欧洲与中东乱局的“隔离体”,也是北约在黑海、高加索、巴尔干、东地中海等地缘政治板块施加影响的支点;而保持欧盟大门的敞开也是西方拉拢、规范和改造土耳其的重要工具。在这种相互需要但无法实现有效管理的联盟模式中,双方关系将回到实用的层面,联盟资格的工具化、联盟合作的议题化和联盟管理的身份政治化将成为趋势。

(作者简介:杜东辉,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研究员;责任编辑:蔡雅洁)